

# 晚清政治思想 研究

小野川秀美／著  
林明德 ● 黃福慶／譯



D 092

9

26

時報書系 三八九



晚 wan  
 清 qing  
 政 zheng  
 治 zhi  
 思 si  
 想 xiang  
 研 yan  
 究 jiu

林明德  
黃福慶

合譯



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

時報書系

# 晚清政治思想研究

原 著 小野川秀美  
譯 者 林明德／黃福慶

發行人 儲京之

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

電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

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

校對 周淑貞

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二號

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一日

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

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

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調換

## 原序

清末的政治思想是由洋務論、變法論及革命論等三個階段爲主軸而形成的。洋務論與變法論皆屬改革論，如站在改革論本身的觀點而言，它與革命論是相對立的。然而從思想發展的觀點而言，把它分爲上面的三個階段比較恰當。洋務論的特色在於輸入西洋的機器，以謀中國的自強。

自鴉片戰爭以來，尤其是以太平天國（一八五〇—一八六四）及亞羅船事件（一八五六一—一八五八）爲轉機，一部分有識之士，已經深感西洋武力的優越性。所謂洋務論就是指承認西洋武力的優越性，並計劃輸入與此有關的機器及技術而言。洋務原稱夷務，因爲中國人認爲西洋是屬於夷狄之故。洋務論的目的在於承認夷之長處並師夷學，藉充實軍備以圖謀自強，所以洋務論也稱爲自強論。在太平天國的激盪時期，洋務論者中甚至有人提倡幾近變

法論的言論，他們認爲應該學習西洋所以致強的原因。這個論調被傳統論者視爲具有異端性質的改革論。然而這種異端的洋務論，經過中法戰爭（一八八四）以後，其比重逐漸升高，終於釀成變法論的擡頭。

變法論也稱爲自強論，但是與洋務論不同的地方是前者較重視內政，認爲最根本的先決問題在於政治的革新。由於變法論的重點在於政治革新，所以他們一再認爲西洋的富強，有比軍備更爲重要的因素，而這個因素就是西政。自甲午戰爭（一八九四—一八九五）以後，對於西政更加關切，更由於從經書中探索改革原理的傾向，使之與西政發生關係，清末的變法論亦因而成立。經書與西政是支撐變法論不可或缺的兩大支柱。變法論主張制度上的根本改革，這一點與洋務論有很大的差異。兩者雖然同屬改革論，如果就兩者的特徵而言，則洋務論把重點放在機器上，而變法論則着重在制度上。

在洋務論興起以前，就已經有人提出有關改革弊政及刷新吏治的意見。洋務論者中，也有不少兼提改革內政的。但是洋務論所說的內政，不論其在成法之內求取變通之道，或險越成法來改革，都是以中國的傳統爲依據的。他們認爲內政的改革應依據中國的傳統，軍備的充實應仿效西洋的機器與技術，也就是說要學習西學，而且較重視內政，以上的主張，與洋務論有頗多相似之處。這個主張稱爲中體西用。如果將西洋的機器及技術，原原本本的輸入中國，可能會遭受那些具有根深蒂固文化傳統背景的官僚及讀書人的反對。因爲除了中國，還有對等的文化存在，這是華夷思想所不能容忍的。清朝自中葉以後，這種華夷思想似乎有

增強的趨勢，因此有人提倡附會說，認為西洋機器及技術，在原理上，早已在中國的諸子百家中萌芽。果真如此，那麼機器是西洋的東西，也是中國的東西，因此輸入西洋的機器，不是可恥的事。洋務論是以這種附會說作為根據，想藉此充實軍備，將之付諸實踐的，就是所謂的洋務運動。

變法論主張軍備為末，內政為本，並認為自強的根底，維繫於君民一體，上下一心的關係上。他們從經書及諸子中探求這種政治態度，而且對於西政也是從這個觀點上去注意的。經書首重「周禮」，而諸子則首重「墨子」，後來又推崇「春秋」公羊學，因為其中有許多地方陳述變革的理論。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說及大同說逐漸支配着激進論者的思想。激進的變法論認為經書與西政不是異質之物，兩者有密切的連帶關係。西洋之致強實為經義之精，亦即與經書的根本意義暗合，他們認為講求西政，必須將本源溯至古代，並求其合致之迹。他們不僅將西洋的機器與諸子百家予以連貫，而且還將西洋的政治與經書加以附會說明，這種態度，在甲午戰後，深受知識分子的歡迎。他們一方面從經書中求取原理，另外又在現實問題上求取西政之範，這一主張，並不是中體西用，而是中即西。如果西政與經書的根本意義暗合，那麼學習西政，並不是可恥的事，反而是遵從孔子之意。變法論的附會說比洋務論更為徹底，就因為徹底，所以其改革的主張也就更為強烈。倡導從制度上作根本改革的戊戌變法（一八九八），就是這個主張達到頂峯的表徵。

無論如何，變法論依舊是改革論，變法論是肯定清朝為前提，他們再如何激進化，在現

實問題上，依然沒有逾越「君民合治，滿漢不分」的範圍。就以消除專制政體而言，他們的目标雖然與革命論相同，然而變法論卻沒有排滿思想，縱然有，也是非常脆弱。這一點，就與以排滿為第一前提的革命論有很大的不同。自戊戌政變至義和團事變之間，革命派與變法派之間，時有合作之意，而終歸失敗，實由於這個大前提相異之故。自義和團事變至日俄戰爭之間，革命派的勢力快速成長，與變法派形成對立。變法派中有打消君權變法的念頭而投向革命的，共鳴於革命的留學生與日俱增，贊同排滿共和的華僑也增加不少。日俄戰爭發生後不久，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成立，與變法派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。革命派內部雖然也發生對立，他們之間的意見縱然相左，然而革命論卻壓倒變法論而站在時代思潮的先鋒。

義和團事變以後，變法論方面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除了政體問題以外，採取了新的倫理問題作為革新的對象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梁啟超的「新民說」。他把民族性的改造與社會倫理，作為當前的課題。無可否認，這是受到西洋的近代思想，尤其是受到進化論及民約論很深的影響，由於受到進化論的影響，乃將西政、西學與經書加以附會說明的當否，加以反省，結果明白指出兩者的性質不同。他認為價值的基準在於真理，而不在于孔子，附會說是奴隸根性的表徵。一向根據附會說而在採用西學與西政時給予積極證據的變法論，想藉此切斷兩者之關係，使其採用時加以合理化，這是附會說終究會遭遇的必然結果。「新民說」認為孔子與經書在其表面上仍然沒有喪失其權威，然而其絕對性卻被否定了。否定其絕對性，意味着傳統思想、華夷思想已開始動搖。縱然附會說已經動搖，但是附會的主體仍然存在於

中國的傳統中。成爲中國傳統核心的孔子與經書，一旦依照眞理詢及其價值，而且奴隸性受到責難時，這就象徵了被理想化的古代形象已經幻滅。在否定孔子時，有一段時期非全盤承受西洋文化不可，這就是民初所提倡「全盤西化」的新文化運動。經過這一段啓蒙時期以後，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內外情勢相結合，發揚國家主義而掀起了五四運動。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使年輕的知識分子感到興趣，另一方面中體西用論行將復活的階段，也在持續着。梁啓超那種平易的文章，成爲文體革命的先驅，這是眾所周知的。

如果這個看法沒有錯，那麼「新民說」可以說是倫理革命的急先鋒。文體革命及倫理革命爲新文化革命所標榜的兩個目標。就以排滿與政體問題而言，義和團事變以後，變法論與革命論相較之下，雖然逐漸消失其重要性，然而其對文化的貢獻卻比革命論爲大。革命論與「新民說」在某種意義上，可以說給辛亥革命與新文化運動，帶來豐碩的果實。

如能將洋務論、變法論及革命論的關係，像以上所敘述的加以歸納，其具體的內容及成立的過程究竟如何，爲了闡明這些問題，擬以變法論爲軸，加以深入探討，這就是收錄本書的幾篇文章的主旨。



## 譯者的話

本書原著者小野川秀美教授，一九〇九年生於日本高知縣，一九三三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東洋史學科，歷任東方文化研究所「囑託員」（特約研究人員）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，副教授，京都大學教授等職。

本書初版於一九六〇年問世，之後著者再進一步研究，增加「義和團時期的勤王與革命」及「劉師培與無政府主義」兩篇，而於一九六九年再版，本書係根據再版本譯成。

著者在本書中將會承擔了時代使命，震撼了時代的思想家如康有為、譚嗣同、章炳麟、梁啟超等的思想，作了精闢的分析，深受學界的重視。套一句塚本善隆在序中的一句話：「我坦率地說，我有信心向日本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界推荐，小野川副教授是我們研究所中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），最有前途的人」（一九六〇年三月）。本書之出版，證

實了塚本的話。本書不僅對理解近代中國的政治及思想，奠下基礎，而且對於研究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學者專家，提供了很多極具價值的問題及見解，實為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最後必須要一提的是在臺灣有許多文獻已茫無可稽，無法將原文加以還原，因此有些部分，祇能照日文原意翻譯，這是要向讀者致歉的。本書疏漏之處，在所難免，尚祈讀者專家指正。

譯者識

# 目錄

原序

譯者的話

第一章	晚清的洋務運動	一
第二章	晚清變法論的成立	四九
第三章	康有爲的變法論	八七
第四章	譚嗣同的變革論——其形成過程	一六七
第五章	戊戌變法與湖南省	一九二
第六章	義和團時期的勤王與革命	二三七
第七章	晚清的思想與進化論	二六五
第八章	章炳麟的排滿思想	三〇四
第九章	劉師培與無政府主義	三六〇

## 第一章 晚清的洋務運動

洋務論是一種輸入西洋的機器及技術，以謀充實軍備的改革論。洋務最初稱爲夷務，是爲總合凡與西洋有關事務的名稱。外交及通商事務自不待言，有關基督教的問題不僅包含在洋務之中，而且輸入西洋的機械及技術，亦屬於洋務。所以在廣義方面言，重視與洋務有關的各種議論，固然屬於洋務論，就狹義方面言，僅強調輸入與西洋的武力有關的機器及技術的議論，亦稱爲洋務論。當然不是有意將其他事項置之度外，但洋務論的重點，乃在於輸入機器及技術，以變法論的立場所說的洋務論，這種情形尤其明顯。機器及技術稱爲西學，從這個意義上言，洋務論可以說是以西學爲媒介的改革論。

包含洋務的改革論，其發端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發生的時候。魏源在「海國圖志」中所顯示出來的思想，可以作為代表。魏源的「海國圖志」及「聖武記」都是受到鴉片戰爭戰敗的刺激所寫的。道光二十二年（一八四二），魏源在兩書中分別寫有有序文。鴉片戰爭時期，魏源曾在代理兩江總督裕謙麾下擔任幾個月的幕僚。裕謙督辦浙江海防期間，正當英軍相繼奪下定海，占領鎮海縣城之時，裕謙投水自殺<sup>①</sup>。「聖武記」及「海國圖志」兩書是作者從戰爭的體驗中撰寫的。「聖武記」主要在記述清朝開國以來的武功，而「海國圖志」則把重點放在世界的地理及各國的沿革上。兩者皆為憂慮時勢，致力於經世之念的著作。「海國圖志」雖然着重於地理及沿革上，但是對於有關西洋的情勢及西洋機器的記述也加以整理收錄，同時對於南洋、西洋各國的宗派、中西曆法的異同、中西的紀年等，也各有記載。後來也增加了有關回教、天主教及地球天文等項目。相信作者在可能範圍內想將當時的海外知識盡量加以網羅。

根據序文，「海國圖志」是爲了要瞭解西洋的情勢，是爲了「以夷攻夷」、「以夷款夷」、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」的目的而撰寫的。「夷之長技」包含戰艦、火器、練兵三點。魏源主張在廣東設置造船廠及火器局<sup>②</sup>，並在福建及廣東的武試中增加水師一科，實行裁兵以提高

① 支偉成「清代樸學大師列傳」卷十四，魏源之項，及「東華續錄」卷十，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己酉，九月己未之條。

② 「聖武記」卷十四的軍政篇中的記述爲「造砲不如購砲，造舟不如購舟」，看起來似與「海國圖志」相異，但是主張輸入西洋船砲這一點則相同。

士兵的待遇。因為他承認西洋的武力較中國優越，除非輸入西洋的船堅砲利無他途。如果要對付西洋，必須瞭解西洋的情形。因此他主張設置譯館，翻譯夷書<sup>③</sup>。當然魏源不認為如此就可以與西洋抗衡。在「海國圖志」的序文中，他主張必須除去人心不覺醒之弊及人材缺乏之患，他非常重視人心之覺醒及人材之登用。這實與「聖武記」的序文中所說「人材進則軍政修，人心肅則國威適」具有同樣的意義。肅人心，進人材，也成為日後變法論的重要項目，而魏源將其方法用所謂「綜核名實」來檢討<sup>④</sup>。這種方法也可以說在於祛除推卸責任、因襲及外表的虛偽<sup>⑤</sup>。

肅人心，進人材，瞭解西洋的情形，輸入西洋的長處，講求對抗西洋之道，這些都顯示在「海國圖志」的思想中，尤其是輸入西洋的長處，是為當時最具先見的主張。對於瞭解西洋情形的重要性，兩廣總督林則徐早已重視了。他在官府衙門延攬了精於翻譯的人材，又囑咐貿易商、通事、領航人員等從各方面去打聽，而且每天應提出報告，或委託外國人購入英國的書籍。以當時「驕傲自足，輕慢各種蠻夷」、「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，又不詢問考求」的中國官場而言，林則徐被認為是不尋常的人物，所以外國人認為「林係聰明好人」對

③ 「海國圖志」卷二，籌海篇三。

④ 「聖武記」卷十一，武事餘記。參照馮友蘭：「魏源——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國先進思想家」，列島編「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」所收，頁三二八。

⑤ 「太子太保兩廣總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銘」，「古微堂外集」卷四。

他頗示好感<sup>⑥</sup>。他不是頑固的自大主義者，他不但是一位主張對外強硬論的人物，而且也致力於瞭解西洋的情形。魏源的「設置譯館翻譯夷書」的主張，無可置疑的是出自林則徐。「海國圖志」最初也是以林則徐所翻譯的「四洲志」<sup>⑦</sup>作為根底，再參考其他書籍加以增補而成的。魏源的主張應該說是繼承林則徐而加以發展的。道光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），五十卷本的「海國圖志」首次出刊，二十七年（一八四七）重刊時增補為六十卷，及至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增補為一百卷，至此即成為定稿而問世。據說這百卷本是根據葡萄牙人瑪吉士的「地理備要」及美國人高理文（F. Coleman Bridgman）的「合省國志」加以增補而成的。魏源本身的經世之見，主要在前面的「籌海篇」二卷之中，其他雖然大部分都是收錄其他書籍的記載，但是由此可以想像得到他對於這部書的完成，的確抱着很大的熱忱。

在這個時期，與「海國圖志」同為受人矚目的是「瀛環志略」。這本書是福建巡撫徐繼畲自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（一八四三——一八四八），根據外國人的地圖及其他書籍加以整理完成的一種世界地理書。該書並沒有什麼經世的主張，只是期望把地圖的記載力圖正確，這一點他用心良苦。劉鴻翔在該書的序文中有「最近的『海國圖志』幾乎都是猜測」的記述，由此可見「瀛環志略」實含有匡正「海國圖志」誤謬的意義。無論如何，「海國圖志」及「瀛環志略」是繼林則徐所翻譯的「四洲志」之後撰寫而成的，都是關心西洋情事

⑥ 「海國圖志」卷八十一，「夷情備采」、「澳門月報」。

⑦ 「四洲志」是一種世界地理書，收錄在「小方壺齋輿地叢鈔」再補編第十二帙中。

的著作。但是這些著作對於當時到底帶來了何種程度的反響呢？關於這點，郭嵩燾曾經這樣說過：「要其大旨在考覽形勢，通知洋情，以爲應敵制勝之資，其論以互市議款及師夷人長技以制夷，言之始通商之日，無不笑且駭者，歷十餘年而其言皆驗」<sup>⑧</sup>。不管魏源的熱忱如何，在「海國圖志」發刊之初，幾乎被一般讀書人所忽略。「瀛環志略」的情形，可能也是如此。這些著述及魏源那種具有先見之主張受到評價，是在「歷十餘年而其言皆驗」以後。換言之，也就是以太平軍之亂（一八五〇——一八六四）及亞羅船事件（一八五八）的發生爲契機而受到重視的。

## 二

太平洋之亂及亞羅船事件，使中國人深感西洋武力的優越。定都於南京後改稱天京的太平軍，自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）曾國藩收復安慶以後，即將作戰的主力轉向江浙。李鴻章及左宗棠分別奉命爲江蘇及浙江巡撫，其原因也在此。李鴻章親眼看到由外人編成的常勝軍非常活躍，在浙江，左宗棠也接觸了由中法混合編成的花綠頭軍的活動，親眼認識到西洋的堅甲利兵，他們對於洋務的關心，實發端於此。日後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辦造船廠時，即聘

⑧ 「養知書屋文集」卷七，「書海國圖志後」。



諸日意格 (Prosper Giquel) 及德克碑 (Paul d'Arguebelle)。他們在左宗棠討伐太平軍時，均協助編組中法混合軍，共襄討伐之舉。

如果說太平天國之亂是促成曾國藩、李鴻章、左宗棠等留意洋務的契機，則亞羅船事件是直接震撼北京的主因。眾所周知，亞羅船事件是以天津條約（一八五八）及北京條約（一八六〇）之締結而告一段落。也可以說，在鴉片戰爭以前就已經發生的華夷思想的紛爭，至此被強制地作了一個結束。當然覲見問題，日後仍未解決，而華夷意識雖然受到很大的動搖，但是並沒有打破。自此以後公文書中已不能再稱外人為夷，也允許外國公使駐紮北京，而且一直將條約視為示惠的想法，已不能再通用了。在英法聯軍之役時，逃亡熱河的咸豐帝駕崩，以此為契機，已經表面化的怡親王載垣、鄭親王端華及肅順等陰謀也已潰滅，因此極端守舊派的勢力已被排除。此時，即以被外國人評為「在北京最開明的政治家的指導者」<sup>①</sup>的恭親王為中心，對列強採取了協調的方針。

以此為背景，所謂洋務即在北京、上海、福州等地展開。根據天津條約的規定，英法美三國於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）在北京設置公使館，處理列強外交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相繼設置。一向被視為朝貢國而受理藩院管轄的外交事務，至此才有了獨立的機構。為了通達各國情形使不致於受外人欺騙起見，乃於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）在總理衙門附設同文館，教授外國語言文字，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），更在同文館附設了算學館。「西人製器之

① Philip W. Sergeant, *The Great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*. P.40